

写在前面

周令飞



2021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我的祖父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9月是他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我的父亲周海婴于2011年去世,转眼已经十年;至于我,也将七十,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人生荏苒,还有几个十年呢?十年啊,于国于家,总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时间节点。于是我想,祖母和父亲生前,为鲁迅的文化事业四处奔走,殚精竭虑,至死不渝,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而我从事鲁迅公益文化事业也已二十载。作为鲁迅的嫡传血脉,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总该做点什么吧!

平时,我常常浸淫在鲁迅相关的书中。鲁迅说过,没有祖传的文学家。虽是鲁迅长孙,我应该说并没有天然地承袭祖父的文学基因,坦白地说,我不是文学专业人士,与鲁迅研究界以及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相比,我自知相差甚远,这本书仅是我平时阅读后的结果,算是自己视角的选择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目睹染病者的不幸,耳闻人世间的疾苦,感叹生命脆弱、人生无常。在忧心与焦虑中,我经常整夜无眠,不时翻看一百余张祖父的原版照片。在电脑里,我把他的照片反复放大、拉近,可以依稀感觉到他沉重的呼吸。我确信亲人间是有感应性的。在夜里,我也常想到父亲,像过电影一样,眼前一遍又一遍浮现他平日和病重时的脸庞,耳畔不时响起他让我一生守护祖父的叮咛。父亲希望我有生之年永远做“鲁迅义工”。

鲁迅在遗嘱中嘱咐后人,不要做空头文学家、空头艺术家,父亲嘱我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鲁迅是周家的鲁迅,是我敬爱的祖父。然而,我更知道,鲁迅是中国的鲁迅,世界的鲁迅。鲁迅不死。作为长孙,做“鲁迅义工”,传播普及他老人家的功德,于国于家,都算是最大、最实在的事儿。我想,我后半生的努力,应该无愧于先祖。

最后,我把十多张鲁迅照片做了彩色修复,是与时俱进,也是“还原”!
(摘自《鲁迅代表作》,鲁迅著,周令飞选编,作家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今的商业社会,生活之弦绷得紧紧的,幽默是生活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德国作家胡戈在《傻瓜年鉴》指出:“人生越严肃,就越是需要诙谐。”

什么是真正的幽默?美国作家休斯下了注脚:“所谓幽默,是到口的肥鸭竟然飞了而还能一笑置之。”

休斯所谓的“一笑置之”,不一定指的是开心的笑,也许是心有不甘的苦笑哩!在这个骨节眼儿上,当然苦笑比勃然大怒或恼羞成怒得宜,或相对怡然得多了。

马克·吐温更是说到骨子里去:“幽默的内在根源不是欢乐,而是悲哀;天堂里是没有幽默的。”

走笔至此,读者肯定感到索然无味,因为这太像抛书包,抛得太不像样了,一点幽默也没有。

谈到幽默,在中国作家之中,我首先想起林语堂,他老人家早年还办过《幽默》杂志。

如果要月旦或褒贬,林语堂式的幽默也许是属于休斯式的、源自美式的幽默——美国人临死之前,往往还不忘幽自己一默——开自己的玩笑。说穿了,也不过是强颜欢笑而已。

说到幽默的深刻,钱锺书先生倒是少有的例子。

过去在与钱先生交谈中,曾摘下他在讲话中的妙喻与幽默。兹录如下——

他在谈到老年人时说道:“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比如日常生活问题,也不易应付,小如一张凳子,一扇门,一层楼,都是天天碰到的东西,也可以任意使用它们,一旦年老了,好像这些东西都会使乖,跟你为难,和你较量

钱锺书的妙喻与幽默

潘耀明

一下,为你制造障碍。至于身体上的功能,包括头脑的运作,年轻时候可以置之不理的,现在你都得向它们打招呼,进行团结工作,它们可以随时怠工甚至罢工(笑)。所以我的写作计划不是没有,但是只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

在谈到他的代表作《围城》时,他说道:“代表?你看我这个是代表什么?又不是‘人大代表’的代表(笑),所以也没所谓代表不代表,你说是吗?只是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自己并不满意。那个时候写得很快,不过两年的工夫。这次重版之前,我重新看了一遍,觉得许多地方应当改写、重写,因为错字错得很多,但要改写,甚至重写是很花功夫的。我当时只在词句上作了很少很少的修改,但出版社一定要出,只好让他出。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笑),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出,应该比《围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运,当时大约写了二万字,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乱哄哄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找不到。这我在《围城》的《重印前记》中提到过,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

在谈到他的《宋诗选注》,他说道:“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终身制’(笑)。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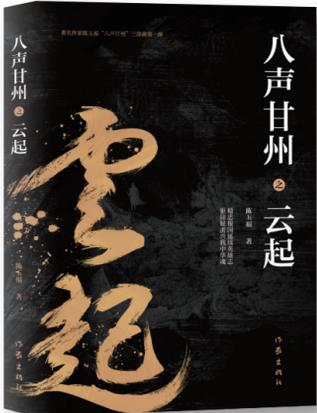
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笑)。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大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说到写文章时,他说:“有一位叫莱翁·法格(Leon Fargue)的法国作家,他曾讲过一句话,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子。他说,假如你追一个女孩子,究竟喜欢容易上手的,还是难上手的?这

续写杨家将后代传奇的英雄篇章

——读陈玉福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 胡平

历史上,杨家将声名显赫,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晓杨家后裔、曾任明末甘肃总兵的杨嘉谟,同样是一位骁勇善战、精忠报国的将领,为戍守边疆立下过卓著功勋。一世功勋彪炳,却在史书中鲜少记载,殊为缺憾。但关于他的传说在西部民间一直流传,始终延续。今天,陈玉福发掘出这个中国西部的英雄人物,以将近50万字篇幅的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演绎出他的传奇事迹,叙写《北宋志传》《杨家府演义》新篇章,我们可以预见,一定会形成一种新的西部文学景观和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西北作家自有西北作家得天独厚的地方优势,陈玉福成为张掖市即古甘州所在地专门引进人才后,便不再管国内其他作家都在写什么,专心致志搜集资料,苦心经营,心无旁骛,将小说写成了一部充分彰显西部文学传奇特色的作品。他认为,甘州精神就是中国西部精神,西部文学首先是英雄主义的文学,而杨嘉谟正是历史上西部英雄的杰出代表。当然,陈玉福本人的写作气质也浸透西部色彩,他为西部奉献出的这部小说场面往往雄奇,情节常常陡峭,节奏绷紧,充斥豪放粗犷的阳刚之气,大漠风沙之气,与江南文学婉约隽永的气息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语言不事雕琢,但刚好与作品的整体风格相得益彰,烘托出作品浓郁的异域氛围。

我们不知道小说内容里有多少取自史实,多少来于虚构,但无论如何,作品中杨嘉谟的一生充满艰险与挑战,历经坎坷又屡建奇功。他自世袭职凉州卫指挥金事始,便同时面对抵御外部侵略和官场腐败势力的双重压力。作品肇始,已升为凉州卫指挥使的杨嘉谟驰援庄浪卫,向瓦剌军奋勇作战,却因得罪了甘州府镇守太监侯大鹏,借机打压,定为死罪,幸遇甘肃镇总兵的斡旋改判流放戍边。到古甘州后,他坚持调查芙蓉香内幕,扳倒侯大监势力,却被制毒毒品的后台肃王所憎恨,惹来杀身之祸。出狱后又直奔战场击败瓦剌军人侵,成为固守甘肃镇的重将。瓦剌与卫拉特联盟开始设计沟通明官僚上层,通过构陷使杨嘉谟获通敌罪再次被判死刑,并趁机发兵长驱直入。在形势极其危机的时刻,杨嘉谟被放出监狱戍边,他重整旗鼓后重创瓦剌,收复失地,使卫拉特盟不敢轻举妄动长达十余年。升任甘肃镇总兵后,杨嘉谟力行屯垦戍边,发展农业,使甘州成为鱼米之乡。在后金向大明用兵,威胁朝廷安危之际,56岁的杨嘉谟被崇祯帝调任副镇总兵,稳定天下大局,并削弱了李自成的进攻,致努尔哈赤于死地。直到他被皇太后极视于眼中钉,派人施毒,一年后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此后仅两年,大明王朝寿终正寝。

显然,作者所塑造的杨业后代杨嘉谟,其形象并不逊色于北宋先人杨家将,他与祖先同样以拱卫边疆、忠烈报国的功绩尽显光辉。如此形象,即使来到今日环境下,也仍然不失为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典型示范,这正是《八声甘州之云起》的核心价值所在。当然,与杨业相比,杨嘉谟经历上的更大特点是一生蹉跎,数度为来自内部的奸臣所陷害,几次命悬一线,较之杨业曾被政敌中伤的际遇更为令人扼腕。陈玉福抓住了主人公起伏跌宕的命运主线,突出写照了内忧重于外患的情势,对于深化作品主题作用匪浅。

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朝末年西北地区种种乱象。一方面是宦官当道,侯大监假公济私排除异己,尽力

不近女色,但他刚愎自用,待人多疑,导致属臣谨言慎行,无人真心辅佐。加之宦官弄权、竞争激烈,人心涣散,灾荒四起,表面繁荣下早隐藏重大危机,终于在满清和起义军的夹击下江山一朝倾覆。小说中杨嘉谟虽然获得了崇祯的信任,但始终面对的最大敌人仍是内卷。通过他的生平经历,读者能够真实体验到明末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阅读感受丰富具体,这是普通历史教科书无法带来的阅读体验。

作者善于构筑复杂又相对集中的人物关系,借此刻画主要人物形象。小说里,杨嘉谟并不孤单,其伯兄杨嘉臣和杨俊始终是他的得力臂膀,与之一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从开篇起,身为庄浪卫镇抚的杨嘉臣便与杨嘉谟共赴沙场,并情愿与杨嘉谟同赴刑场,此后和杨俊常跟随在杨嘉谟左右。杨俊原为金刀帮帮主,与杨嘉谟不打不相识,后义无反顾加入杨嘉谟的队伍,屡建战功。杨嘉臣和杨俊都是杨家将的后人,身上同样流淌着忠君报国的热血,他们的加盟及杰出表现,使这部作品成为另一部《杨家将演义》,重现了杨家将的本色与声威。同时,也使作品通篇洋溢侠肝义胆、英雄结盟的民间色彩。作者对甘肃镇总兵达云和他的儿子、凉州卫指挥使达奇勋的设计别出心裁。表面上,达氏父子与肃王、侯太监等和平相处,甚至参与毒品分赃,对杨嘉谟等则严厉有加,一度势同水火,但两人并不缺乏正义感,心中自有数,只为保障军需绥靖于肃王和侯太监,在关键时刻,仍然挺身而出支持了杨嘉谟。在一段较长时间内,读者摸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生出许多疑惑,更使作品显出扑朔迷离的曲折,表现出作者编织故事、引入情境的技巧。

在这样一部充满阳刚之气篇幅浩大的军事题材作品中,难免需要女性角色的加入,以协调和活跃情节氛围,作者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肃王的女儿青崖郡主曾欲将杨嘉谟送入虎口,后喜欢上杨,却因父亲阻拦抑郁死去,激化了肃王与杨嘉谟的矛盾冲突。丁大先生为报恩把女儿丁兰嫁给杨嘉谟,而一身戎装的程英也爱上杨嘉谟,遭到杨的拒绝。程英不惜冒死丁兰诉说衷情,丁兰竟也能够理解程英,瞒着夫君操持了纳聘之事,此后与程共同辅佐杨嘉谟。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发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下,又与小说主脉络环环相扣,读来使人感到新奇陌生,又尽在情理之中,对衬托杨嘉谟的身影、圆满整部作品的浑厚旋律产生了显著效果。

《八声甘州之云起》是陈玉福创作上的重要收获,也是西部乃至张掖市的重要收获,相信经由这部作品的问世,张掖这座西北古代重镇将重新吸引来人们关注的目光,促进其在新时代里更加强盛和发展。

从《荒原问道》到《鸠摩罗什》,再到《西行悟道》,徐兆寿一直在“西部”耕耘,这“西部”不只是指地理位置上的西部,也指他笔耕不辍多年中“发现”和“定义”的西部精神气质与理想观念。“生命中必须有一块地是荒芜的,它不是供我们来的,而是供我们实在的心休息的,供我们功利的心超越的,供我们迷茫的供来这里问道的。”从地理环境的辽远和疏阔中寻找精神力量或追求灵魂救赎并非新鲜独创,甚至容易落入地域偏见的陷阱,徐兆寿的特别在于致力于从荒芜西部的山川河流、荒漠苍林中追寻文明起源的秘密,甚至是文明起源之前,“人”与“天地”的互动。徐兆寿并非要做历史学或人类学的学术考察,而恰恰是要在既有的学术体系之外重谈“怪力乱神”,重塑辽阔的西部世界的另一种天地情致。

在徐兆寿笔下,西部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天马,有乐舞,更有骁勇善战的各个民族部落。诸神纷争的年代,西部世界崇尚野性、自然、随心所欲,游牧民族的“草原往事”为中原文明输送了元气,但古老的蛮荒力量却也因中原文明的兴起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封建血统对原始传统的凌驾是进化论角度的前进,却也是对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天道自然的遗忘。徐兆寿首先击碎的,便是今天的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中心论,不管是西方的欧洲文明中心论还是中国的中原文明中心论,徐兆寿为我们揭开被黄土尘封的文明故事,甚至是史前故事,为我们讲述文明的变迁与变迁之中人类思想精神的漫游。

《何谓究“天人之际”》是文集中相当重要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徐兆寿借参观司马迁墓的机会与学生讨论什么是“天人之际”,一问一答之间颇有《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意思,在形式上更是风雅十足。文章讨论司马迁对天、人的理解,其实是今天的我们对司马迁的理解,我们观察的是比我们睿智得多的古人如何看待他那个时代的未知,而这未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算不上难题,或者说,有很多人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一难题的答案。从董仲舒的视“天”为祖宗教到司马迁的认为上天并非不可把握,而是有规律可循,徐兆寿其实是向学生介绍了“天道”的意义,而与这种意义相关联的,是《周易》,是河图洛书,是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八卦”与《易经》的真理在于,将人视为天地之一物,与天地运行的真理相通,即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徐兆寿想要厘清的古人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如汪洋般的大智被今天的我们悄然忽视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在《佛道相望》一文中,徐兆寿再次讲起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信奉“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晚年进入《易经》的世界,“将变化无常的命运与人的道德合为一体,将功名得失也与人所遵奉和履行的道德视为因果关系”,儒道实现了思想根源上的契合,它们两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便是佛家的用武之地,佛家最为圆满地回答了人类的终极追问。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已经不再时常想起的时代,伟大的先圣们为我们完成了怎样艰难的功课。而这三家的起源与流变都与西部有关,从《易经》创始人伏羲的民间传说到天水麦积山石窟的佛像,儒释道三家的疑问与对疑问的认知、

解决始终扎根于西部大地。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却终究要留下痕迹,徐兆寿跟随痕迹溯流而上,追寻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旨归今日人类精神与灵魂无根飘零的困境。今天的我们还有可以依凭而能无困惑的“天道”吗?今天的我们身处繁华都市还能欣赏文明起源的荒芜落寞吗?今天的我们还有兴趣,还有能力了解圣人的言行与智慧吗?

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寻找昆仑》理应是本书的压卷之作。如果说《何谓究“天人之际”》中老师与弟子有《论语》的风雅,《寻找昆仑》中与“科学朋友”对话的思辨逻辑则有柏拉图《对话录》的风采。由中及西,由古及今,打破文明中心论的徐兆寿

又在这里打破了科学与现代性的神话。徐兆寿在行文中不断质疑,当我们身处物质极度丰富、科学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是就可以完全依赖现代的知识,不用再去考量那些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更不用说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远古奇谭。昆仑是什么?是名山,是古书中的文明发源,是无数神话传说的皈依,“为什么从古至今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昆仑,不仅仅在寻找原始之地,还在寻找缘起。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初心之地。”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沉迷于对“新”的命名,是要给时代和群体一次次重新出发的机会,却也是一次次将过去和历史抛在身后,今天的我们倡导“不忘初心”,倡导“文化自信”,其实正是一次有意义的纠偏,回看初心,回望曾经使我们骄傲的文化与历史,不是要沉迷于过去的功劳簿,而是恰恰通过回眸的过程发现形塑这些文化与历史的观念,重温那些被今天傲慢的我们嗤之以鼻的信仰。也是以此来回到徐兆寿的终极焦虑,“中国文化到底还能不能给中国人以未来?还能不能说服世界并造福人类?”

理解历史与过去的终极方法便是找寻真正的“源头”,“昆仑”也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象征的能指,我们并不是要找一座实实在在的山,不是要去印证《山海经》和

上古神话里的确切位置,而是去理解对“昆仑”的定位本身蕴藏古老的对于天道运行规律的认知,理解天干地支、五行八卦中的规律与考量,理解古人在对自然万物观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敬畏、自信,理解他们对个体与外界关系清醒的界定与寄予浩瀚苍穹的伟大愿景。如此,我们又有何底气去资格去厚今薄古,有何信心和胆量去盲目崇拜西方科学与科学,有何必要和需求去沉溺焦虑与恐惧?

也是在真正试图和古人亲近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身为后世子孙的我们的诸多执念,如对国家统一的认知,并不是源于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过激的其他情绪,而恰恰是“国家观”之外的“天下观”,

重返鸿蒙之初

樊迎春



是“天下就可分为九州,这是以天的形象来进行的,这就叫地法天。而人也是九宫形,这就是针灸学和中医学的基础。所以说人法地。那么,天又法谁呢?自然。”似有豁然开朗之感,那些被西方民主科学思想规训过的理念突然间有了动摇的预兆,久被修饰的现代灵魂似乎有了返璞归真的可能。我们的生命多久没有触碰真正的天、地、自然?

也许,从精神层面来讲,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的史前史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因为在艰难岁月里,他们拥有美好、坚定的信仰。他们的心灵有如大地一样朴素、动物一样单纯、神一样灵敏。他们简单、纯一。也只有那样单纯的心灵,才能与天地通灵、对话,才拥有最为明亮的眼睛看到星空的变化。在黏稠的时间里,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态度定然与我们现代人有着质的区别。因为那样,他们才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太初哲学,保持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绝对统一性。

“寻找昆仑”的过程是不断与“原初”“太一”“起源”等概念重逢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质疑自己和重新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我们重申古人的“天”“人”之道,重申儒释道的价值起源,反省红尘之中的自我德性的缺失与言行的傲慢;我们重寻“初心”,重寻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创造之初被赋予的逻辑与规律,扪心自问我们对其无情的误解与抛弃。徐兆寿在这样的双重意义上终于实现了对“鸿蒙之初”的追问,对赤诚、真实、纯真的复现。行文中当然也还带有过于敝帚自珍的偏见,或许多少有自证自明的想象与执念,但在共情与纠偏的基础之上,这种重返有足够的价值。不管是天地玄黄还是巍巍昆仑,混沌年代的太一是人类作为生灵的起点,也是之后逐渐偏离“天道”“自然”的开始。徐兆寿并不奢望人类在回望自身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了对原初一切的回归,而恰恰是希望以此抚慰过去,更映照未来。发现来处的清晰与透亮,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的光荣与梦想。“最重要的是打破封闭思维,要走向开放,走向世界图景。”或许这才是徐兆寿真正包容的人文情怀与西行路上悟出的天地大道。